

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

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

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1990年10月

Z260/12

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
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

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8.5 印张 218 千字

1990 年 8 月第一版 199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—80021—266—1/E·208

定 价：4.30 元

前 言

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军事史学理论的研究，繁荣中国军事历史科学，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军事史学的学科体系，更好地发挥军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，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，我们汇编了《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》。本书选载的徐帅、聂帅和杨尚昆主席的文章，对于如何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进行军事历史研究，作了深刻的论述，是很重要的指导性文章。本书收录的论文，涉及军事历史学的形成、发展、内涵、社会功能和研究方法，以及军事历史领域中的一些相关问题，以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军事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。为便于读者查阅中国军事历史的重大事件，特将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军事卷中的《中国军事史大事年表》全文收录。

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李维民、张光彩、胡命烈同志。限于编者水平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请求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90年7月1日

目 录

徐向前元帅谈军事历史	(1)
努力学习军事历史	聂荣臻(3)
关于征集党史军史资料和编纂军事史料	
丛书的几个问题	杨尚昆(4)
军事历史与军事改革	姜思毅(14)
关于发展军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	奚 原(23)
实事求是研究我军战史的根本原则	沈宗洪等(45)
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, 进一步搞好	
二战史研究	王道平(58)
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应着眼其特点与发展	莫 阳(67)
关于建立中国军事历史学的初步设想和建议	李 惠(77)
加强马克思主义军事史学理论研究	徐晓村(89)
战史研究与军史理论的创立	鲍世修(97)
应尽快建立我国的军事史学方法论体系	孙利辉(105)
军事历史学的形成及其内涵	徐 勇(112)
军事历史学认识活动的特点	程广中(119)
论军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	曲爱国(127)
军事历史研究和战略决策	徐 焰(139)
试论军事史料的价值显现和判定	张 晶(147)
军事历史研究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	尹希成(155)
历史比较法在军事历史研究中的运用	周彩钦(161)
把握海军史研究的几个特殊性问题	苏读史 赵会生(167)
研究军事历史, 提高指挥艺术	石玉山(175)
附录: 中国军事史大事年表	(182)

徐向前元帅谈军事历史^①

过去，我在同《军事学术》杂志社的同志谈话时，谈了学习军史、研究战史的问题，再讲，没有多少新的话说。《军事历史》杂志的同志要我讲，我就讲点意见，和同志们研究。

军事历史是一门科学，是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的组成部分。外国的不必说，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战争如林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。他们进步的军事观点、治军主张、指挥艺术和谋略战术，都是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。现代的军事思想，现代的战略战术，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。因此，学习军事历史，对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我主张，我们的指挥员多学点历史，多读点军事历史方面的书。我是喜欢看兵书的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精力不够了。我们的干部要认真读书，要读懂它，写点心得笔记，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。张天夫同志写的《诸葛亮〈将苑〉注释》很不错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军事科学院搞的《孙子兵法新注》也不错，通俗易懂。军事历史包括的内容很广泛，军事不是孤立的，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基础，政治环境。军事技术的进步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的程度。因此，军事历史的研究也是一种综合性研究。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做到这一点。

近几年，我看到国防大学出版了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，军事科学院翻译出版了《苏联军事百科全书》，说明我们对军事历

^① 本文是作者应《军事历史》编辑部之约所谈，发表于1988年《军事历史》第1期。

史、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成绩的。但是，和许多国家比，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比较薄弱。苏联在这方面比较重视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出了不少，还有电影。我们在这方面花的功夫不够。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游击战争，但成套的东西拿不出来。我当国防部长的时候，有的兄弟国家向我们要这方面的东西，我们拿不出来。我建议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专题研究，总结出系统的经验来。

军事历史，包括战史的研究，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要造成一个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局面。高水平的研究成果，只有在民主、和谐的气氛中才能产生出来。如果前人说的，什么人定的，都不能改变的话，那么军事学术的研究就会变成一潭死水。

军事学术（包括军事历史）的研究要面向部队，和部队的实际相联系。研究工作者要经常深入部队，注意发现和研究部队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同时要把研究的成果采用电影、录像、幻灯、通俗读物等形式，发到部队去。使部队的干部、战士们能看到，并以此推动部队的教育训练。如果部队干部能和院校干部、研究机关的干部定期地进行交流，那我们军队的工作就搞活了。

请《军事历史》杂志的同志们代我向全军指战员问好。

努力学习军事历史知识^①

聂荣臻

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，是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故乡，军事人物众多，军事典籍浩如烟海。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。世界各国也有许多杰出的军事人物和军事著作。我们应该进行研究。研究军事历史，不是为了钻故纸堆，而是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，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。因此，研究军事历史，一定要坚持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的正确方针。

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史学，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学科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史学理论指导军事历史研究，正确揭示军事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，才能总结出合乎科学的战争指导经验。

军事历史又是进行国防教育的生动材料，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必修课。凡有志于献身国防建设事业的人，都应该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和掌握丰富的军事历史知识，做到博古通今，以便更好地把握今天，驾驭明天。

新年伊始，祝《军事历史》取得更大的成就！

^①本文系作者应《军事历史》编辑部之约所写，发表于1988年《军事历史》第1期。

关于征集党史军史资料 和编纂军事史料丛书 的几个问题^①

杨尚昆

征集党史资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而征集军史资料又是征集党史资料的重要内容。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是打了几十年仗打出来的，军史资料在党史资料中占很大比重。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就有叶挺的独立团和卢德铭的警卫团等，这是我们党掌握的武装力量。再远一点，从孙中山开始建立军队，我们党就做了大量军事工作，黄埔军官学校就是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。这个时期的历史材料也应该征集。以后，我们党建立了军队。起初很少，慢慢发展壮大，建立了很多根据地。经过了土地

^①本文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节，摘自1984年7月9日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；第六、七节，摘自1985年9月13日在《红军长征》、《八路军》、《新四军》史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。经作者同意，收入本书。

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这几个大的历史阶段，史料非常多，非常丰富。但是，现在我们手上拥有的却非常少。所谓少，是说能够反映军队和根据地面貌的生动资料，搜集到手的实在太少了。汇集起来的资料，就是10本《星火燎原》，大多是一些片断的记录，有一定的价值，但还远远说不上完备。我们现有的资料，还只是些“骨头”。如三大战役，书上写了哪年哪月打了哪个战役，经过怎样，这都是些“骨头”。我们写军史、战史，不能只有“骨头”，还要有“肉”，要有大量的历史资料。

第一步的工作，或者说打基础的工作，就是把资料征集好。有的同志说“抢救”历史资料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征集资料就是带有抢救的性质。写历史要靠正式文件，即党中央的电报、报告等，但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，这些正式文件保留下来的很少。拿过去的电报来说，不要说一个团、一个师、一个方面军的，就是总部的，现在也找不到一套完整的，哪怕是抄件。据我所知，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从毛儿盖会议到陕北这一段，资料就很少。八一电影制片厂拍《四渡赤水》，想找有关的命令都找不到，本来是有命令的，就是因为战争环境，这些东西烧掉了。1925年到1932年，党中央在上海指挥全党，这一时期的资料很多也都烧掉了，留下来的很少。党中央从延安撤退的时候，也烧掉了很大一批资料。

我党历史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，是过去共产国际保存的我党文件。那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文件，都送给共产国际，在那里保存了一部分，解放后，交回给我们几百箱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《纲领》和《决议》，就是其中的两份文件。最近发现的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，也是从共产国际保存的文件里找出来的。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这个材料拿给我看，要我鉴别是谁写的。我看了不能断定。他们又拿给陈云同志看，陈云同志经过长时间辨认、回忆，肯定是他写的。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的文件，现在只有这一份了，这是十分珍贵的。

二

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任务是很繁重的。你们这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：一要广，二要专。广，是指所有的资料，即使是一点线索，也要想方设法加以搜集，包括健在的老同志的回忆和他们保存的资料。前不久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前副总编索尔兹伯里要写长征，从遵义到甘肃红军长征的路线他都走了，路上还遇到好几个老红军，这些老红军是当年负伤留下来的战士或基层干部。他在乌江边还发现了当年为红军撑船的艄工，带路的向导。让这些人写长征或写某个战斗，他们写不出来，但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生动的历史材料。请你们去找一找这些线索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，无非是在南方那几个省：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等，再加上陕西。朱总司令的老家四川仪陇县还有当过红军的人没有？我估计还有，大概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了。这些地方也请你们去征集一下。不需要去很多人，派个把人去调查访问，人家知道多少就写多少。一些老根据地和红军走过的地方，还保留着一些标语，索尔兹伯里在川西阿坝一带，就发现了一些。有的老红军手中还保存着一些资料。这次看到同志们征集到的部分文件资料，都很珍贵。这些东西应当继续征集，我想还会征集到很多。上面讲的是要广泛征集。

在广的基础上还要专，也只有广的基础上才能专。专，就是要有重点，搞专题。比如红二方面军，就要搞清贺老总是怎样从湘西发展起来的，他后来在湘鄂西搞到什么规模，等等。贺老总早年当过澧州镇守使。我们的高级将领里还没有当过镇守使的人。你们不是列了很多专题吗？专题，无非是一个根据地，或者一个事件这类专题。三大战役是我们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，是非常重要的专题，现在还没有占有详细材料。写三大战役，不能象写党史、军史那样一般地写，而是要写清楚每个战役的经过、各

个阶段部队是怎么打的，这需要更加丰富的材料。东北抗联，也是一个专题。还有很多没有搞成的武装起义，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。如河北的高阳、蠡县起义，当时也建立了红军。陕西也有这样的起义。四川有刘帅领导的顺庆、泸州起义。江苏也有，是陈云等同志在那里领导的。1931年我在江苏省委时，徐州、海州、蚌埠这一带，就有农民武装，刘瑞龙同志当时是徐海蚌的地委书记。除了三大红军主力外，还有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，陈先瑞同志领导的陕南的一部分红军。再就是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。就陕北来讲，刘志丹、谢子长他们也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搞起来的。象这些史料，现在有很多都不完备。要把这些专题的有关资料都收集起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，毛主席就指定了一个党史起草委员会，董老是书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把这个工作给耽误了。“文革”前，我在中央办公厅，根据中央的决定，为了给将来编写党史提供研究资料，印了一些中央文件汇集，还出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中央电报专集。“文革”中，因为这事还给我加了两条罪名，第一条说我“偷窃中央文件，扩散机密”；第二条说我“为彭德怀树碑立传”。现在看来，我当时编少了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损失了不少历史资料，老同志保存的毛主席的信，他们和中央来往的文件、个人日记，有许多都烧掉了；自己没有烧的，也被红卫兵抢去烧了。这个损失很大。今后，你们还是要广泛地收集，在广泛收集中搞好专题征集。南方几个大军区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为一个专题进行征集，这是对的，是应该的。

现在军队中各种资料要广泛征集，包括“活资料”，也包括“死资料”。“死资料”就是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各种文物，包括红军留下来的标语。还要找些见证人。总之，征集任务繁重，范围很广，工作非常重要。

将来写历史，不能只靠干巴巴的几句话。象现在有的党史本子，写红军长征和根据地，都是只提那么一两句，这是不行的。

要用生动的党史资料，对我们的青年，包括军队里的青年战士和干部进行教育。这些青年战士、干部，他们脑子里比较深刻一点的东西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的事情，军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等等，他们根本弄不清楚。因此，要用党的历史对他们进行教育。

三

涉及到重大的问题如何评价，要由中央讨论后才能下结论。我最近看了一篇有关叶挺同志的回忆录，讲他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的情况。新四军被敌人包围后，叶挺同志为了挽救剩下的一百多人，带几个人下山去跟国民党交涉。他那时是蒋介石正式委任的新四军军长，又是著名将领，他相信可以把这部分人救出来，没有想到蒋介石敢抓他。可结果呢，一下山就被蒋介石扣起来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对叶挺怎么估价？我认为这是他应有的行动。因为部队打散了，饶漱石化装成连的文书跑掉了，叶挺同志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又如，对林彪怎么估价？林彪在东北那一段，除了在若干问题上与毛主席相对立外，包括进关，一直打过长江，打到海南岛，应该说，应肯定的方面不少。不能因为他以后叛国了，就说他从东北起就一坏到底。无论如何他还是红军的一个战将，他是打了不少仗的。对这样一些人物作历史的评价，要由中央来讨论。

过去，对有些烈士有争论。现在有的恢复名誉了，有的还没有作结论。如红七军的李明瑞，现在纪念百色起义，给他立了一个碑，就把他的名誉恢复了。中央苏区的季振同究竟应不应该杀？季振同是二十六路军起义的，以后怀疑他要把队伍拖走，就把他杀了。这些事情不是仅用哪一个人的回忆录就能做根据的，要历史地评价。

我还说说另外一些人的情况。有一个叫龚楚的，在井冈山时

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，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。此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，还带敌人去抓陈毅。后来，龚楚写了《我与红军》一书，在台湾、香港广为流传，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。我看了这本书，曾问过陈老总，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，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。龚楚叛变这不好，但对他在红军那一段表现应如何看？还有个叫何涤宙的，他原是国民党陈时骥部的工兵主任，五次反“围剿”被红军俘虏后，我们把他留在红军大学教学，后来一直在总部当参谋，参加了长征。到瓦窑堡时，根据中央内定的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可以入党的精神，发展他入了党。但西安事变后，他去西安时却叛逃了。又比如一一五师有个参谋长叫周昆，是林彪的老部下，抗日战争时他在洪洞，从国民党那里领了几十万元法币的饷，开小差跑了。象这样的一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可以不作历史的评价。涉及这些人的资料可不可以收集？当然可以收集，因为他们有一段参加革命的历史。他们叛变革命的事实当然也是抹煞不了的。但对项英这样的同志，还有张国焘这样的人物怎么评价？我认为应该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评价。象刚才说的林彪，就不能说他从头到尾都坏。前些时候，东北的同志拍电影，排戏，就不敢写林彪。陈云同志不是说了吗？对林彪应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察。涉及这些人的有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结论，不是你们能作的，要由中央来作。那是将来的事。写历史要各方面都站得住，评价要公道。

四

现在大批退下来的老干部都可以写一些材料。写材料可以有两种，一种是写史料，不是回忆录，不准备印，也不准备出版；一种是写他自己的回忆录。说到回忆录，我觉得问题比较大。邓小平主席就讲过，他不写回忆录。当然，他是因为工作忙而不

写。我看到一些回忆录，里面有些史实，但也有些东西不真实。其原因不外是两种，或者是不了解情况；或者是不实事求是，甚至故意夸大自己的作用，借写回忆录把自己当时的作用、地位和觉悟拔高，这就不好。现在个别的回忆录，的确有这种倾向。

出版回忆录不要看成是小事。我不主张大量出回忆录，而是有重点地出。要大体符合历史，正确，公道。一句话，要实事求是。但是不妨动员所有能写的同志都来写，写了你交给我们嘛！正式出版要给稿费，写出来的回忆录不一定都出版，但也可以给点稿费。

《彭德怀自述》是一本好书，但是不是每一件事彭德怀同志都记述得恰当呢？他那时手头一点材料都没有，完全靠自己记忆。他的记忆力是了不起的，但时间长了，不要说年月日记不准了，就是一些人和事也记不清了。所以完全根据《彭德怀自述》写军史肯定不行，因为有些地方他记错了。最近出版了聂帅的回忆录，第二册也快出了，是很好的材料。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录，中央好几位同志都看了，认为他写得不错。第一，他实事求是；第二，他把自己摆进去，这就很有教育意义。

五

历史上都是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写历史，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写的。前朝人死了，后朝人要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我们现在不能这样。我们要广泛搜集资料。写出我们经历过的这段时期的历史，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，也让后代人有可靠的根据，继续研究这段历史。我们要用正确的历史材料对青年进行教育。当然细节不可能都搞得那么完善，但大的方面无论如何要准确、一致。不能各说各的。如果以后各根据地、各野战军，各写各的历史，互不联系，互相矛盾，在大的问题上有分歧，就不能作为正本去教育青年，教育我们的后代。

六

编纂《红军长征》、《八路军》、《新四军》三部史料丛书，这项工作很重要。红军长征、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，都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。编纂这三部史料丛书，我建议你们好好学一学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起草这个决议的几次谈话，主要是学习关于历史问题的写法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精神；还要学一学 1945 年的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主要学习它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。这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，用小平同志的话讲，就是两点：第一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；第二，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。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编纂史料丛书的方针。

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，就是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，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环境、具体情况，不能用现在的眼光、当然更不能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那种对待历史的极端错误的态度来看问题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也就是说，要掌握这样一个原则，任何事件的发生，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、历史背景，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。有些事，既有其积极的方面，也有其消极的方面。人物也是一样。一个人在长期的斗争中，不可能一贯正确，也不可能都是错误，总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，或者一个时期是好的，一个时期有错误，这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，不能凭主观臆断作结论。

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，就是说，对于一些现在有争议的问题，不宜写得很细。我们主要是写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和重要作用，写八路军、新四军英勇斗争的历史，写得太细。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好处理。

前不久，我和乔木同志谈如何写党史时，也讲了这两点，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，二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。还有个回避

的问题，回避并不是不写这个事，而是不要写得太细。我们现在编写史料丛书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如果写得不好，第一违背史实，第二不公道，第三还会引起不团结。你们提出，对于某些重大争议问题，采取回避的办法，或者整理成内部资料，我看是可以的。

七

对于历史人物，我们要客观地评价。比如，我们军队的两个元帅，一个是彭德怀，从庐山会议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把彭德怀说得一无是处，但历史上的彭德怀并不是这样的嘛。“七大”时，毛主席对百团大战并没有作结论，说这个问题放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再说。后来斗争彭德怀时，就把百团大战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，说他违抗命令，不守纪律，不报告中央等等。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另一个是林彪，他最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。但不能因为他叛国，就对他一概否定，而不作全面的、历史的评价。林彪在中央苏区，在长征路上，在抗战中，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，还是有功的。陈云同志在谈编写《辽沈决战》一书时曾指示，对林彪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写。我们对待历史人物，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，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。

总之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，对一些有重大争议的问题采取回避的办法。一些有争议的问题，如果有不同意见，暂时不能求得一致，可以放一放；有些问题没有什么大的争议，就可以作结论。这三部史料丛书是可以编好的。当然，也不能要求这次编出的丛书就算是定本了，将来还可以修改嘛。但是，也不能因为不是定本就可以随便编写，我们编的这些史料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。历史就是事实，事实是不能假造的，不能写假史。